

建构被净化的精神乌托邦

——夏辇生长篇小说《船月》爱情叙事的功能与意义

[中] 涂 鸿*

引言

- 一、爱情：潜在的社会叙事
- 二、人性：乌托邦的纯美叙事
- 三、情感：国家意识的隐性叙事

结语

引 言

中国浙江当代女作家夏辇生（1948— ）已有的三部长篇《船月》、《虎步流亡》、《回归天堂》（合称“韩流三部曲”），不但获得韩国政府奖，而且受到国内外文坛的关注。夏辇生严肃地描写了上个世纪初韩国一群爱国志士在中国成立流亡政府、从事抗日救国的宏图大业。先是展现韩国流亡政府首脑金九结缘中国船娘的《船月》；这是一部叙述方式独特、传奇色彩浓烈的小说，但却真实再现了一段藏匿至深的历史。白凡金九，是韩国的开国元勋，一生为抗日复国而顽强斗争。年轻时曾三次入狱，度过近十年的铁窗生涯；在流

亡中国的二十六年里，更是历尽艰险。夏辇生以自己家族的特殊经历出发，交错回顾“4·29”虹口炸案后金九避难嘉兴的《虎步流亡》。再有是有关“虹口炸案”与韩国义士尹奉吉生命故事的《回归天堂》。这三部作品近百万字，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又被译成了韩文，在中国文学界她成为了撰写韩国题材的第一人。

夏辇生长篇小说《船月》是三部曲的第一部，作品以“船”与“月”为重要的意象，作者在作品中充分展示了中国江南水乡的独特意境，而小说的叙事节奏又以这种意境相吻合，作者以她那江南女子的细腻与婉柔，格调舒缓地、抒情化地展示了在这片空间或背景里所演绎的异国政治领袖与中国江南水乡女子的传奇。20世纪30年代，流亡中国的韩国临时国民政府领袖金九，因在上海策动针对日寇的“4·29”虹口公园爆炸案，为躲避敌人追捕而隐姓埋名，落草中国江南水乡——浙江嘉兴南湖之滨。在当地的爱国富绅，辛亥革命的重要成员褚辅成的精心安排下，与褚家女佣的长女朱爱宝以夫妻名义漂泊水乡五年。在夏辇生极具情感化的叙述里，五十七岁的异族英雄与二十岁的摇船姑娘朱爱宝的激情之恋几乎是作者的叙事动机。无论是历史事件或是虚构情节，在夏辇生的笔下最终都在一个特定的方向上成为合力，融入读者的期待视野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夏辇生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面对重大历史题材时所选择的情感化的价值取向和相应的叙事策略。

《船月》在叙述朱爱宝与金九的爱情遭遇时，采用了宿命论。朱爱宝年少时就有算命先生告诉她日后将遇“贵人”，因此，她与金九在桥头的第一次邂逅便也充满了天定机缘的情调。金九后来在寺庙里为朱爱宝抽得的一张佛签，更让人觉得他们俩是“缘定前生”。宿命式的叙事推进，为小说填入了“神秘性”、“传奇性”或浪漫色彩。在小说的开始那扑面而来的浪漫而伤感的情怀便使人意

识到——爱情这一次又做了故事的核心。早在金九出现之前，朱爱宝已经处在了与哑巴子、阿贵的三角关系中，金九的到来更是吹皱了一池春水，情况复杂了：爱情总是这样，纷纷扰扰，剪不断理还乱。在小说中，金九的坚忍，朱爱宝的坚贞，都向我们提示了真正爱情的本质与要义。尤其是朱爱宝，如果说，从金九这一方看，与朱爱宝的结合多少还带有“权宜之计”的功利意味，而朱爱宝对金九的体贴与奉献却是无私的。且不说两人的年龄跨度，也不说朱爱宝放弃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事关声誉的“名份”，也不说她从此不得已疏远了对亲人的关怀，仅是她对金九的相援其实就是生死边缘的跋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朱爱宝的爱情里那种生死相许的决绝之态。也正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被厚重的尘埃所覆盖的历史支撑物：它可能是一种抽象精神，比如爱情；它也可能是一个人，并且是女人。

《船月》作为一部带有传奇性质的历史小说，显示了作家对抗战历史过程的独特思考以及对人性与人情的独到体悟。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不畏强权、忍辱负重、勇于献身的韩国革命领袖形象，不仅展现了战争洗礼与恩怨情仇的真实历史，还从异域文化的相互比照中对人物的内在精神进行了深刻的剖示。同时作品还以无比动人与浪漫的笔触，展示了中国民间无比真挚而美好的人性。

一、爱情：潜在的社会叙事

夏辇生的长篇小说《船月》以无比浪漫而忧郁的笔触，以江南女性作家的细腻与内蕴，完成了一部带有强烈的使命意识的叙述。小说以诗的激情，激活了历史深处的人性，以爱情为载体，完成了政治与社会的叙事。

小说以独特的叙述方式、浓烈的传奇色彩小说，真实再现了一段藏匿至深的历史。白凡金九是大韩民国的开国元勋，一生为抗日复国而顽强斗争。年轻时曾三次入狱，度过近十年的铁窗生涯；在流亡中国的二十六年里，更是历尽艰险。1932年策划了狙击日本天皇和举世震惊的上海“虹口炸案”后，被日寇悬赏六十万大洋疯狂追捕。在中国同盟会元老褚辅成先生置身家性命于度外的掩护及救助之下，金九率临时政府转移浙江，改名换姓隐居嘉兴，百折不挠地坚持独立运动。其间，一位江南水乡的摇船姑娘，以她的真诚、执著、机敏与善良，在江南河网如织的大运河上给了他一个漂泊的“家”，而却不知这个与她先后生活达五年之久的“男人”究竟是谁！历史有心，战火无情。作者以极富浪漫主义的笔触，带你走进一个有缘而又无缘的浪漫爱情故事里。

就最理想化的角度而言，真正的完全纯粹的爱情，能够相对泯除世俗社会与地域文化所制造的一切差别，而不分国度、文化、种族、年龄、地位等。它可以有多种组合方式，不管在主流社会看来是多么的怪诞、离奇或者另类，但只要它未突破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底线并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我们就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去看待，而不应不遗余力地给予打击。那些以它为“不道德”的指责其实是不合理的。须知，道德本身即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伴生物，是人类后天出于筛选与发展的需要而着意建立的一种自我约束机制，其中必然包涵了某些禁忌。这些禁忌毫无疑问是一定时空条件下整个社会群体理性化的产物。它们服务于追求整齐划一的宗旨，冰冷而机械，以达成一种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的常态。而所谓常态固然是社会有机体能够自我运行的最显著标识。但它与某个具体个体的情感趋向甚至理性选择并无多少关联，且不可避免地会对后者造成一定的破损甚至致命的扼杀，所谓“法律优先于爱，

机械优先于爱。动物性优先于爱，爱就是这样地遭到歪曲。就是在得到赞赏的时候，爱也不过是作为口实的最大的理由而已。把爱当作口实，就是把爱当作欺骗的对象。试图置爱于虚假之中，就是从根本上扭曲人生。” [1]这样，当某种“非常态”的情感凭着偶然机缘突然出现时，已内化为个体意志的道德理性便会对这种情感本能加以自觉不自觉的抗拒。这使得我们必然要经常面对这样的事实：在茫茫人海中，多少个蓦然相逢使人们长久以来已近乎凝尘的心弦震颤不已？人们又有过多少次由于自己的畏缩退让而失之交臂的痛悔？

小说给我们展示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动荡的社会现实里，异国的政治领袖金九与中国江南水乡的摇船女子朱爱宝没有结局的爱情，这是叙事的表层意蕴，其叙事的深层意旨是作者始终在试图完成政治的或社会的叙事，所以作品里的爱情成为了叙事的一种载体。

萨特对爱情的判断是非常悲观的。“爱情是一种事业，即向着我的固有可能性而谋划的有机总体……爱情作为与他人的原始关系是我用以实现这个价值的谋划的总体。” [2]爱情规划了人们一生努力的方向，并在努力的过程中确定了潜在的可能，是我们的出发点，而且爱情也是与他人一种最为质朴的关系，因为他人掌握了一个秘密，我所是的东西的秘密。他人的存在向我揭示我所是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高于自己的。作为爱或被爱者，他总希望成为这样一个“世界上的一切，他是并且愿意是对象”，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是这样的对象，他人的自由愿意在这个对象中消失，别人愿意在这个对象中把他的存在和存在的理由看作为从属的人为性。” [3]萨特深刻揭露了爱情的底情：“这使我们

[1] [日]今道友信《关于爱》徐培、王洪波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P.104。

[2] [3]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P. 461；P. 463。

[3]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P. 463。

完全把握了恋爱者要求被爱者的是么：他并不要求干涉别人的自由，而是想先天地作为对别人自由的客观限制而存在，就是说想与这自由一起并在它的涌现本身中同时表现为一种限制，别人的自由为了成为自由应该接受这种限制。正是因此，恋爱者要求的東西是一种胶质，一种他人的自由本身的稠化。”[4]这就从根本上证实了爱情的不可能，“首先，它本质上是一种骗局并且推置无限，因为爱就是希望人们爱我，就是希望别人也希望我爱他。对这种骗局的先于本体论的领会在爱恋的冲动本身中被给定：恋爱者永远的不满足就是由此而来的……其次，别人的觉醒总是可能的，他随时可能使我作为一个对象到案：恋爱者永远的不安全感就是由此而来的。第三，爱情是永远被一些别人相对化的绝对。应该单独和被爱者在世界上以便爱情保持它绝对归属轴心的特性。恋爱者永远的羞耻(或傲视——在这里是一样的)就是由此而来。”[5]所以作为职业政治领袖金九他永远不可能将自己放置在爱情温馨迷人的情感世界里，他始终都超越着这种存在。金九在他的自传《白凡逸志》里对朱爱宝的记述也是很零散而简捷的。朱爱宝的名字在「下篇」中出现了5次，其中前4次都是极平淡的记述，只有最后一处的叙述内容稍多，同时也夹杂了金九的一些感情。这位政治领袖写道：

离开南京时，我把朱爱宝遣返回她老家嘉兴去了。深感后悔的是，那时只给了她一百元旅费。她只知道我是广东人，服待我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和她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类似夫妇的感情。她照顾我实在功劳不小。当

[5]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P.474- 475.

时，我认为一定会后会有期，所以除了车资外，没有给她足够的钱，真是遗憾之至。

所以作者也忠实主人公的这种情感，在爱情的叙事表层之下流露的是政治与社会叙事的完成，而在《船月》中社会叙事中的自我确认是人的个性得以肯定和张扬的结果，要在个体丰富的个性精神中体现出人类精神、时代精神和历史精神，并谋求一种超越自我的精神高度，这是夏鞏生在《船月》中一直在寻求的。夏鞏生的个人叙事总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不存在纯粹的孤立的个人表达。体现强烈的个人化倾向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此完全放弃了对时代与社会责任的承担，真正的个人化存在方式必然离不开对时代的关心与对现实的思考。

二、人性:乌托邦的纯美叙事

夏鞏生不是一个对人和物持冷漠态度的观察者，她对生活抱着独特的人性理解、真挚的民族情感，时代的风云变幻、大运河上的撻声，执著的理想追寻等这些都构成了她作品的情节发展原则和结构原则。大凡重大的历史题材触目所及是启蒙、革命、战斗、救亡、批判、社会意识、阶级、政治、民族、反帝、反封建等宏大叙述话语，作家们似乎不在家中提笔写战斗之檄文，便须上街头发传单宣传革命，甚至于提枪上战场与敌人进行救亡图存的殊死战。当然这是可贵的，但对文学本质的存在而言，这样的意识形态不一定是唯一的选择。因在启蒙、救亡的二重变奏之外，应该容许不以启蒙、革命、救亡为出发点，而以追求文学自身纯美艺术价值为重心的文学创作，这种“没有主义”的“纯美意识”的审美追求，其价值意义不在启蒙意识、救亡意识之下。

作家不可能脱离客观生存环境(社会、文化、自然等),也不可能无视于时代风云的变幻,这正是作为有思想、有情感的精神个体不可救药的哀歌;同样道理,以笔代剑、驰骋于各式战线上的作家们,也不可能没有梦境的追寻、难以排遣的抑郁。救亡与纯美,在许多作家身上不是二元对立的绝缘体,甚至对同一作家在不同阶段可能做出完全相反的选择。承认作家心态的歧异性,是研究中国作家应有的清醒认知。对纯美的凝望,往往是作家主体精神探索的一个面向而已,但这个面向的存在,即使小在文学史的中心视野里,它仍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船月》的情感传达与叙事带上了纯美的追求,同时也贯注着一种民族精神,这是因为任何美都不是完全抽象的,美本身也总是能够体现一种特定精神的,或者能让欣赏主体感觉到一种精神,《船月》的叙事在一种飘逸而浪漫的纯美追求中,蕴涵着一种中国水乡民间的人性美、一种诚挚而博大的民族精神。而这样的精神又是与我们每个具有民族气节的普通人息息相通的,所以

《船月》成为了重大历史题材小说又非重大历史题材化表现的对于美的艺术创造。夏辇生在《船月》中以恬静平淡的风格,优美浪漫而又略带忧伤苍凉的笔调,构建了她的江南水乡世界。小说借船娘与韩国政治领袖金久的爱情故事,借女主人公朱爱宝用船橹写在水中的日记,展现出一个在战火弥漫的动荡年代充满了美与爱世界。在这里我们体会到了中国民间的博大、诚挚与善良,在水乡澈纯明净的风俗画卷中,作者塑造了朱爱宝、哑巴子、孙桂荣、黑胡子等一个又一个淳朴、诚挚的人物,营造了一片爱与美的世界。总之,夏辇生通过对江南大运河上一些平凡人物的描写,讴歌了具有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为我们营构了用“爱”与“美”编制成的美丽的世界。

与许多传奇小说性爱叙事相反的是《船月》张扬人性至真至善的美。如果说性爱叙事在飘渺的情感深处寻找到性这个具体的存在，那么《船月》全力驱除任何与性有关的传递，如果说性爱叙事凝聚了感官所有的力量向理性反叛的话，那么《船月》则主动将目光从感官转移开来而投放到一个抽象的乌托邦。它们浓缩了东方传统文化的含蓄、细腻、飘逸与俊美，一改追求复杂多义的现代策略，而直接把男女间最纯粹最简单的倾慕爱恋异常含蓄地烘托出来，闪现出出人意料的光彩。

作者以东方民族特有的文化韵味，理性地规范了感性的贪娱，体现着“中庸”之美的传统艺术精神引导我们走出了欲望的领域，步入一个宁静、谐和的乌托邦，以超然、俊逸的精神制高点俯视人类的欲望。在这个纯粹精神的乌托邦中，抒发纯美的人性成为了小说的深层意蕴，《船月》将爱情放置在那个动荡多灾的政治时代，以政治意识形态在极端纯真的情感追求面前的无声退却，衬托了情爱的伟大。这与绝大多数的社会事实相反，爱情战胜政治的入侵只能在艺术想象中毅然前行。从这个角度上说，《船月》将嘉兴与运河这一空间寓言化了，现实色彩荡然无存，留下的是一个似曾相识的美好的乌托邦世界，如宁静的南湖、秀美的江南水乡、蓝色夜幕上皎洁的明月、璀璨的繁星、温情美丽的船娘、动荡年代纷乱的时事与善良的中国百姓，还有那些飘逸的神话传说等等。作品中作者所呈现的是诗一样强烈的抒情氛围，是精致美丽而情感化的语言，透过这些，我们感受到作者对童话般艺术世界的体认。

夏辇生笔下的风俗画是一种与道德完善、人性解放和精神拯救密切相关的伦理现象，是展示生活图景和传递人生经验的手段，她以一种忧郁的、苍凉的、神秘的暗示的态度和开阔的视野来描绘外部的世界和他者的生活，完全不

同于流行的宏大历史叙事或极端的私人写作，在她的极具时代风云的表现里，有的是自然纯美的风景画廊；有的是一些民情风俗，更多的是对善良的秉性的描写。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有着一种神性之光。她以一种介人的姿态，以一种体现着情爱与人性。

在这个寓言化了的存在空间中，二十岁的摇船姑娘朱爱宝将心思放在流亡中国的韩国临时国民政府领袖金九身上（船娘一直认为他是广东商人）这一单纯的爱情理想才变得可能。小说《船月》以虚构空间隐喻的人性世界，并超越了自身所展示的纯美的爱情，更着力于传达纯净而唯美的人性理想。夏辇生所描写的纯美的爱情又全然超越以此进入抽象的人性美的范畴，这是建构精神乌托邦的叙事原则。

长期以来这个被尘封的爱情故事在夏辇生唯美的表达中清新动人。作品中的“幻象”与现实相对话，在动荡的岁月里，男主人公——异国的政治领袖金九的战斗、孤寂、困苦、艰涩、执著的心灵空间里所激起的是对美、对爱的渴求。但是，我们更不应忽略的是作品在发掘爱情的同时又蕴藏着一个走出爱情的政治故事。当五年的风雨同舟结束以后，金九又萌生了对家国与使命的渴望，这位政治领袖又把“民族”、“家国”打进行囊、奔赴前程，并最终荣归故里，而朱爱宝则带着金九的承诺只身返乡，为他做了无数凝聚着爱的精美的鞋子，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重演“望夫石”的传说。其实，直到最后她都没有真正明了金九的真实身份，甚至连他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但她竟为着一个承诺，毅然踏上了寻夫的不归之路。那种绝望而伤感的意味，穿透了夏辇生不可遏制的激情叙述。

艺术进行了一次想象的空间划界，“艺术可以教给我们有关认知与理性的形

式，但它跟生活之间必须保持它应当保持的距离。”^[6]从叙事时间看，为了使作品中的乌托邦世界与日常生活拉开距离，脱离任何现实的功利目的，小说《船月》所营建的乌托邦精神世界被设定在了一个遥远的过去，或在记忆中，或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取消了明晰的现实指向，所以作品带上了浪漫、神秘而唯美的色彩。

作者在精心描绘的纯美意境中显现了中国民间人的精神与品质之美。在那片充满生机，充满活力，象征着人的美好追求和美好愿望的江南水乡与湖光山色组成的画面中，掩盖了时代的纷纭变化与战争的严酷，这种在对纯美的略带忧伤而浪漫的描绘中所蕴涵的善良、美丽的人的中国民间精神，反映了东方民族博大、坚韧、执著、真诚的不可割裂的某些共同的民族品质。

在船娘朱爱宝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令人感动的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她是江南水乡十分普通的乡间女子，她在自己深爱的男人面前是十分纯真可爱的。金九又因为爱宝的梦与自己母亲的梦相近，对爱宝产生了亲近怜爱的感情，把眼前的爱宝比做美丽的鸂鶒。在这里鸟与梦构成了一个被净化的封闭的空间，此刻，朱爱宝与金九忘掉了身边的危险，沉浸在两个纯洁的心灵的交流之中。

朱爱宝朴实纯厚，不识字，但却很相信命运。第一章开首的《漂在水上的日记》中，朱爱宝说出了自己心里一直惦记着的一件事：小时候算命鸟为她叼出来的一张印有船与月的纸牌，和算命小神仙说的“小姑娘有萍水相逢之命”那句话。“萍水相逢”就是一种缘分，预告着朱爱宝将直面于一个甘苦交加，波澜悲壮的因缘聚散的命运。金九在嘉兴与许多普通的民众打过交道。朴实忠厚的嘉兴民众热情地接纳了他，有的人为保护他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哑巴

[6] 马克·爱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王柏华、马晓冬译，北京：央编译出版社，2000. P.8

子，他一直挚爱着朱爱宝，但一旦知道朱爱宝爱着金九，他使用生命来保护朱爱宝和金九，最后为了掩护金九，被日寇打死。在临死前看到朱爱宝和金九都在自己身旁，他笑了。作者这样描写他的笑：

是风声。撒着脚从四面追来的风声。还有乘着风从远方飘来的笑声。笑声，是清脆的，畅怀的，无拘无束的。

那是她和哑巴子的笑声。

哑巴子的笑声，不是从嘴里发出来的，而是从眼睛里飞出来的，像无数只驮着阳光的鸟，她能听到它们欢快的鸣叫。

这种笑声，常常是在一个他们玩熟的戏里迸出来的。这个游戏，是他们很小的时候玩起的。

这里的鸟有如童话小说《七个太阳》中的太阳鸟，是光明和欢乐的使者，它起的作用就是将哑巴子的死净化，升华到纯美的意境。可见，《船月》中鸟的意象来源于作者的童话世界，起着一种升华，净化，美化与神秘化的作用，为作品带来了丰富的想像空间。

三、情感：国家意识的隐性叙事

国家意识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或阶层创立的反映统治阶级政治主张和政治见解的理论体系；是现实的阶级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社会存在在统治阶级观念上的反映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国家的主导政治意识和主流政治意

识；是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的行动纲领。任何国家意识形态都是一种维护意识，它必须要保持国家政权体系的顺利运行和社会的稳定，亦即所谓的国家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

从理论上讲，国家意识作为国家这一“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具有“虚幻性”，但并不完全是“虚假的”，它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全民性”，体现了一定的“共同利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7]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国家沉沦和民族存亡就成为了中韩两国最重大的社会忧患，这种社会忧患辐射并渗透于中韩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成为中韩社会变革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根据。同样，由于日本对中韩虎视眈眈，对日关系也就成为“国家意识”最鲜明的体现者，成为文学作品弘扬民族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

五四以来民族危机促进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现代民族国家的创立成为20世纪中国共同的历史诉求，国民精神的现代化转换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在时代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历史中获得了无比深厚的思想底蕴，新文学现实主义也因此得以发展壮大。

夏琴生的长篇小说《船月》对女性主人公生活经验的叙述仅仅是作品的表

7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卷第84页。

层，而作品的意义的深层支点则主要集中在“家国”、“民族”、“独立”之类语义的介入。于是作品的有关内容得以毫不费力地转化为鲜明的国家意识。例如小说中对主人白凡金九的描述，作者在深入描写他经验世界以及心理波澜时，始终没有忘记叙述的目的：“我”与家国合而为一的产物。

中国当代女诗人舒婷曾表示：“我从来认为我是普通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我的忧伤和欢乐都是来自这块被河水和眼泪浸透的土地……纵然我是一支芦苇，我也是属于你，祖国啊！”^[8]新时期女作家出之自然地参与了时代语言的交替。而其中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叙述个人经验的指向，并非法国作家、文艺理论家埃莱娜·西苏所倡导的性别自觉，而是基于对建立特定的国家目标的渴求。只不过她们有时会近乎本能地从个人经验出发，批判现存的社会结构。无疑女作家夏辇生是属于中国结束旧的时期，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影响下步入中国当代文坛的女作家。如果进一步追问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中这种现代化理念的性别标准，就不难发现新启蒙主义思维本身所具有的片面性。正因如此，这一时期女性创作中有关女性经验的叙写，主要体现的并不是女性性别的苦难，而是对国家、民族苦难的承担，其实质仍是一种国家话语的美学形式。与此同时，那些似乎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个人感情空间的存在意义也不能不受到制约。

随着文学革命事业的开展，文学观念中“社会革命这一性质的突出和极端化，给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带来了两个结果。首先它淡化了男性于批判，其次它淡化了女性的自我反思”^[9]从这样的表达方式中，我们可以触摸到现代性民族

88]舒婷：《生活、书籍和诗》，《福建文艺》1981年第2期。

99]禹燕《女性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

国家话语的一些重要特征:这里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个人,说话者实际上是以代表国家、人民的我们”出现的,并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正义感和崇高感。

小说《船月》是以一种正义的、崇高的使命意识,为中韩两国人民当年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谱写的一曲友谊颂歌,作品突出地刻划了韩国爱国志士、韩国的缔造者之一金九不屈不挠的艺术形象,同时也描写了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褚辅成一家,并化了大量笔墨塑造了江南水乡船娘朱爱宝的形象。在作者情感的传达与表述里,隐退了自我,体现了鲜明的国家意识。同时小说中的鹧鸪与红爪鸟、杜鹃花与无穷花象征性地表现了国家之间、文化之间、民族之间的因缘关系。

从政治学上看,国家意识即国家政治意识形态(**state-levered political ideology**)即有人认为是“意识形态首先及最重要的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和词汇”。^[10]尽管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幻的虚假的意识,国家意识形态不过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但我们只有客观地、辩证地去理解这种阶级性和虚幻性,才能真正地理解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作为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国家利益是一种虚幻的普遍利益,那么,国家意识形态就必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意识,国家意识形态就没有真正的意识主体。但既然国家照例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因此,国家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韩国反抗日本独立运动时期流亡中国的临时政府的重要代表金九对民族与国家的体认应该代表了韩国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金九在《白凡逸志》的最后表明了他的愿望:

¹⁰[10] Leonp. Baradat, Political Ideologies: Their Origins, and Impact, Impact,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3, p. 9.

如果上帝问我的愿望是什么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愿望，是大韩的独立。

如果再问我下一个愿望是什么时，我的回答还是：我国的独立。

即使第三次问我其他的愿望，我也大声回答：我的愿望是我大韩的完全自主独立。……

金九一生奋斗的是大韩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他鲜明的国家意识在《船月》和《虎步流亡》中都有所表现。所以这也是他与船娘朱爱宝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作为政治领袖的金九，他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权宜之计来对待中国江南水乡的船娘，他在中国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嘉兴绅士褚辅成的安排下，寻找了一位不识字的船娘朱爱宝以夫妻的名义隐藏于民间，她并不知广东客商张先生（金九）的真实身份，却以无比的真诚与淳朴将金九视为亲人。爱情容易被历史所遮蔽，尤其是当它涉及到政治领袖更是如此。但对于文学来而言，爱情无疑是对历史进行“祛魅”的途径，它软化了所有被“历史”锻打得失去感官能力从而总是面无表情的“历史人物”。当爱情故事发生在民族危难的背景里，它又会象许多其他富于自我牺牲的品质一样，最终汇入救国救民的宏大叙事里——对家意识的隐性表现。

结 语

岁月似歌，往事如烟。夏辇生长篇小说《船月》对那段尘封往事的寻踪，是动情而苍凉的，她以一种温馨的回忆和浪漫忧郁的叙述打捞起了一个埋藏在已逝岁月中的动人故事。

小说以韩国开国元勋金九抗日战争时期率领临时政府在浙江嘉兴一带顽强抗日的经历为背景，通过作家的历史调查和丰富的史实资料，以一种极富浪漫主义的笔法，再现了一段藏匿至深而又可歌可泣的历史。小说通过对“船”与“月”的象征性描述，将浪漫与现实融合在一起，展现了极为凄凉而又悲壮的审美内涵。作者神奇的想像，童话式的描写，为小说拓展了叙述的空间，而船娘、船、橹、河水，明月、算命鸟以及超越一切的感情，又都构成了作品的优美的意象。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韩国政治领袖金九以对民族独立与建立统一的国家的执著追求，消解了他与中国江南水乡的摇船姑娘朱爱宝恋情，在他们五年的风雨同舟结束以后，主人公又将“家国”、“民族”打进行囊、奔赴前程。作者在她那委婉、飘逸、蕴藉的叙事深处实践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情感表述，同时也传达了中国民间的美好情愫。

【参考文献】

- 1、 [美]戴卫·赫尔曼（马海良译）《新叙事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2、 [美]苏珊·S·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3、 [荷]米克·巴尔（谭君强译）《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 4、 [美]戴卫·赫尔曼（马海良译） 《新叙事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5、 格非（刘勇） 《小说叙事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7、 夏鞏生 《船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 8、 夏鞏生 《虎步流亡》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 9、 夏鞏生 《回归天堂》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 10、 夏鞏生 《着火的蓝月亮》 少年儿童出版版社 1999年版。
- 11、 夏鞏生 《七个太阳》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版社1999年版。
- 12、 朴宰雨 《韩中国际合作精神的艺术表现——论中国现代小说里韩人抗日斗争的反映》， 载《当代韩国》 2005年冬季号。
- 13、 杨正润 《人性的足迹》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14、 王侃 《爱情中的历史与叙事——〈船月〉 阅读札记》， 载《小说评论》 2000， （03） 。
- 15、 余岱宗 《革命的想象:战争与爱情的叙事修辞》， 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5， （03） 。
- 16、 江哲文 《[以诗情激活历史深处的人性——夏鞏生长篇小说<船月>研讨会议纪要](#)》， 载《[小说评论](#)》 [2000,\(03\)](#)。
- 17、 宣德五 《[韩国隆重纪念白凡金九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载《[当代韩国](#)》 [1999,\(02\)](#)。
- 18、 陈莉菲 《[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后的金九](#)》， 载《[民国春秋](#)》 [1997,\(04\)](#)。
- 19、 吴非 《[韩国名人金信的中国情](#)》， 载《[紫金岁月](#)》 [1998,\(04\)](#)。

- 20、金仁权 《[金九对韩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哲学思考](#)》，载《[当代韩国](#)》[2000,\(04\)](#)。
- 21、许懋汉, 鲍翔麟, 何雪祥 《[朱佳蕊其人其事——记当年护送金九先生到南北湖的褚夫人](#)》，载《[档案与史学](#)》[1997,\(04\)](#)。
- 22、石建国 《韩国独立运动在浙江》学苑出版社2005版
- 23、金台俊 《朝鲜汉文学史》，张连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版

建构被净化的精神乌托邦

——夏辇生长篇小说《船月》爱情叙事的功能与意义

涂 鸿

【Abstract】

Tu 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Construct the Purified Utopian of Spirit

——The love's narrative function and meaning in Xia Nian Sheng's growth novel 《Summer moon》

Chinese contemporary female writer Xia Nian Sheng's growth novel 《Summer moon》, that did not only describe love stories, which was an unusual implicative and pure love, and clear up the short of love by relying on the dedication of ideal and the revolution, and melt the fear of death and the years' solitude in

strange country, by been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life and revolution and heat of life .Novels described on the symbol of "moon", together with romantic and realistic, revealing the very desolate and tragic intension. Moreover which standing out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ontaining a love story about political. The hero novels Korean political leaders BaiFanJinJiu and China's girl ZhuAiBao whom were rowing boat and come from JiangNan, after five years' standing together regardless of situation, the hero put "home", "national" into the first place. In writer's circumbendibus, elegant, restrained depth said : emotional expression about national state interest ante omnia.

Keywords: novel 《summer moon》 love narrative function and meaning